

刘着急先生

王德威

一九七六年九月初我抵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(Madison),开始留学生涯。我的学习专业是比较文学,导师和系中其他教授都是美国人,专长皆为欧美文学。然而我考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比较文学,必得求教东亚系教授,与刘绍铭先生因而结缘。

当时刘先生已是港台学界及报界闻人。精于翻译之外,他的小说《二戏游记》写尽一个世代华人学者的众生百态,读而不倦,尤能引起读者共鸣。而那时威斯康星大学可谓人文荟萃。以五四研究闻名的周策纵先生,红学专家赵冈先生,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先生,还有以自由主义享誉的林毓生先生都在此任教,加上校友诸如颜元叔、锺玲先生等对母校的捧场,吸引众多学子如我者前来朝圣。

初见刘先生是忐忑的。他的办公室位于 Van Hise 大厦十二楼。犹记当时房门虚掩,有如空城计,敲门后好一会儿,刘先生探出头示意进门。如今想来那时的刘先生才四十出头,好不年轻。他个头不高,衣履光洁,最引人注意的是手中的烟斗和满室烟草香味。先生一口广东国语,讲得快了,颇有囫圇吞枣之姿,问起我的背景,顿时亲切起来:我们同出身台大外文系。但刘先生当年在台和白先勇、李欧梵、叶维廉、陈若曦等合办《现代文学》的丰采,后之来者的我们简直望尘莫及。

《现代文学》那张有名的编辑群合照中,刘先生端坐中央,白先勇、欧阳子各居左右,可以看出他在同学心目中的位置。刘先生年纪稍长于其他同学,神情也凝重一些。后来阅读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,才明白刘先生早年谋生求学的艰辛,对他日后必有深远影响。他幼失怙恃,小学毕业即辍学,在印刷所、书店、的士站打工糊口,但不减向学之心。当他辗转以侨生身份进入台大时(1956),与他同年(1934)的学生已经毕业了。1960年,刘先生毕业后回港任编译。《现代文学》那张照片应该是毕业前所摄,1961年他获朋友资助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语系进修,之后转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比较文学。

刘先生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,短短几年历经威斯康星大学、香港崇基学院、新加坡国立大学、夏威夷大学后又回到麦迪逊,异动频率惊人。他似乎在寻觅,找寻安顿自己的地方。的确,当时的刘先生不论姿态多么平易近人,总好像有些局促不安的因子藏在心中。他的散文机锋处处,冷隽幽默,但本人却习惯性的蹙额蹙眉,言谈之间甚至有种明天不知如何是好的迫切感。他喜欢的民国才女不是有名言:“个人即使等得及,时代是仓促的……”久而久之,学生给他取了个外号——刘着急。

刘先生到底着急些什么呢?我常常想:是我们学生用功不够,反应迟钝?是美国汉学界之善可陈?是他的“老残”情结,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非其所愿?二残连老残的时候也没赶上?还是过早进入社会,错过了生命中的青春机会,再怎么追也追不回来?众人皆曰刘先生的幽默独具一格,我总以为他的幽默里还有些别的,只能说是冷眼旁观的意味。或曰刘先生讲义气,是非分明,焉知他的冷眼之中没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偏执?



长草地与蝴蝶(油画)文森特·梵高

选自上海博物馆“从波提切利到梵高——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”

妙老头刘绍铭

黄子平

此生结识的妙老头不多,在北京有《读书》老总沈公沈昌文,在香港,则有刘教授绍铭大兄。刘绍铭我十好几岁,是六十年代跟白先勇、李欧梵一起创办《现代文学》的前辈,我平日跟随学生喊他“刘教授”,书信来往或书籍赠阅,他称我子平老弟,对于绍铭大兄,似足旧时香港市井声口,也是好玩儿。生而能妙,是先天禀赋,老了,没有变糟,老而益妙,在这个无聊乏味越来越糟的人世间,活成一个有趣的人,是修为,也是福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京沪两地的修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之间,传看一部大书,夏志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知晓了以前闻所未闻的名字: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锺书……我读到已经传看得甩皮甩骨这部大著,心想主持翻译的这位刘绍铭何许人也,作下了如此功德?

初识绍铭大兄本尊是三十三年前。在哈佛开一个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。第一次见识了“正经学术会议”的有板有眼。譬如发言不超过二十分钟,超时有两次铃声提醒。开会讲规则,确实是契约社会了,就大佩服。轮到绍铭大兄发表寻根文学,讲论阿城韩少功残雪不已,不料叮的一声还剩三分,叮叮两声时间到。绍铭大兄

就恼了,扬声说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讲者,理应宽假三五分钟才对。我当即悟到了“跨语际文化交流”中的“平等”不等于“公正”。进一步的追问,就会论到美国研究法国文学或德国文学的学者,均以用法语德语发表为傲,为何研究中国文学,非英语里希冀为。

绍铭大兄一辈子做翻译,教翻译,评翻译,含英咀华,中英对译的可能和不可能,信和达和雅,难信难达和难雅,关联到文化价值的冲突、对接、融合,毕生念兹在兹,了然于心。是故他会极度推崇余英时先生,顶着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压力,在美国汉学英文

论述的主流中,毅然而立,坚持用中文著书立说,成就卓然,说他是“量才适性,以身弘毅”,良有以也。

刘公年轻时曾以二残为笔名写小说,后经夏济安师点拨,说散文随笔才是他的擅长,遂以随笔散文为志业,这也是或一意义上的“量才适性,以身弘毅”了。刘公的散文,东拉西扯,风月无边,天南海北,涉笔成趣,是阅世极深,读书极多的积累,重桥说他深得英国 essay 的神髓,确为的论。

十年前,中华书局(香港)百年纪念,出版《香港散文典藏》丛书,我编选了一本刘公的散文集《蓝天作镜》,在序里定义随笔的写作,是在“官僚语言”(《一九八四》)和“后现代呓语”(pomobabbles)的包围之下,凝神守候新鲜的词语和新鲜的思想,此乃“兀自燃烧”的妙文妙句之所以为妙,也是妙老头儿之所以为妙的真谛。

又一个妙老头儿走了,哀哉!——诗人说,先辈们化作星星升入天空,吾人却仍生存于暗夜之中。

2023.1.10 于律敦治



逝者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佛时,有机会休假半年,决定回到母校小驻并作研究。刘先生几乎每两三期就请我到学校的教授俱乐部喝酒聊天。坐在面朝大湖 Lake Mendota 的落地窗前,永远是一杯他喜欢的 Martini straight up,熟悉的长吁短叹,打开话匣子便天南地北地闲聊文学人、文学事,之后开车载我回家晚餐,再开车送我回住处。

那时他得知我有意离开哈佛,立刻积极安排为我谋职。恰巧葛浩文(Howard Goldblatt)教授任教的科罗拉多大学开缺,我面试后顺利入选,正考虑签约之际,夏志清先生突然来电告知退休在即,坚持我必须前往哥伦比亚面试。刘先生原本为我运筹帷幄,对夏先生的半路杀出颇不以为然。但最后两人达成共识,成全了我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如今回顾,仍然惭愧得一身冷汗。

九〇年代以后,刘先生回到香港客座,亚洲、美洲来来去去,我们时有见面机会,听听他对人对事犀利的点评,妙语如珠,更见豁达。再过几年,听说他决定自威斯康星提早退休,接受岭南大学教职。消息传来,很多人不解。但只要细读他早年的《二戏游记》,也许答案就在其中。

回到香港之后的刘先生感觉上比在美国更自在些。年纪渐长,他对外在的一切似乎看得也更淡了。风雨平生,香港是他自小熟悉的地方,也是艰难成长的所在,他决心终老于此,仿佛与他的身世作出和解。

2015年冬天我到香港,又一次和刘先生见面,约在屯门海天酒楼吃饭,他亲自在酒楼的鱼肆点选海鲜。席间的刘先生依旧谈笑风生,但酒喝得少了。那晚在座的还有郑树森教授,和我的两个学生高嘉谦、魏艳教授,俨然是三代同堂的聚会,宾主尽欢。

之后我和刘先生还见过几次面,但那晚的印象最为深刻。记得离去时的殷殷道别,扶着车缓缓走进出租车,心中特别有所感触。我的老师八十多了。回旅馆的路上想着,在海外四十年,刘先生总是看着有点莫名的着急。回来香港这些年的刘着急先生,现在终于不着急了。

又是毅衡兄给我发来消息,说李文俊老师去世了,“噩耗来得急如雪片,寒气刺骨”。

这一两年走了多位师友。我写过几篇怀念他们的文章,却越来越胆战心惊,就怕再看到这样的消息,也不想再写这样的文字。不过,想到李文俊老师,我还是要写上几句。因为我又想到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那篇著名的祷告词:

没有谁是一座岛屿,
自成一体。
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,
都是大海的一部分……
每个人的离去都带走我的一部分。

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期间,李文俊老师是我的导师之一(我们当时有一个导师班,由各个导师分别讲授不同时期的英美作家与作品),他主讲的是福克纳和美国南方文学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有一阵子还真迷上了福克纳,尤其是 Yoknapatawpha County Series(尤克纳帕塔瓦郡系列)的内在于结构。这是作者虚构的一片南方土地,充满了象征性与互文性,却又栩栩如生地真实。我还认真做了一个关于尤克纳帕塔瓦郡的故事内容、人名、地名的索引,最后却只写出了一篇关于《献给艾米莉的玫瑰》的批评。许多年以后,我自己开始写长篇小说时,发现自己也同样是真真假假的上海打转,居然也这样一本本地系列下来了。在外文所读研的日子里,我还有幸窥见了李文俊老师不太为人熟知的一面。一天我在外文所的走廊里见到他,他刚从加拿大访问归来,悄悄把我拉进他办公室,乐呵呵地给我看一本最新版英美诗选,厚厚,有五六百页。那些年学术交流出访一次,也就几十美元的外汇津贴额度,买这样一大本大部头,可能就让他倾囊所有了,但他值得。我踌躇再三,开口向他借了,花两三天时间把整本书复印了。后来分配回上海社科院,从事翻译与研究,多次用到了这一复复印订本。

也是因为这本诗选,辗转让我开始翻译《意象派诗选》。漓江出版社接受后,我一再给李文俊老师去信,请他为这本翻译集子写序,他答应后很快就寄来了序文。

其中有这样一段话,“裘小龙同志曾业于名师,在英语诗歌方面下过一些功夫,目前又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。他既译诗,研究诗,自己也喜欢写诗。由他来译一本既需诗的知识又需用诗的语言来表达的书,自然比较理想……有几年,小龙与我在一个单位相处,也许因为我年事稍长,又在某种程度上是诗歌爱好者与译介者的关系,小龙一定要我为他的译著写几句话。我固辞不果……”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勉励。

八十年代末去美国后,渐渐与李文俊老师中断了联系。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还不流行电子邮件,一方面也可能是潜意识中,“燕然未勒归无计”的虚荣心在作祟吧。要到了九十年代末在美国获得学位,并开始写小说后,才有了较多回国机会,与李文俊老师有过几次聚谈。其中一次是我去北京为一本小说做背景考察,在中国社科院旁边的一个餐厅(好像是属于社科院的),请了几位在京的师友一起小聚,其中有李文俊老师、董衡巽老师、黄梅同学、钱素素同学,还有裴长洪同学。我给两位老师带去了自己的英语小说,就像当时给他们交自己的作业。记得那天裴长洪同学在席上大谈英美畅销小说,董衡巽老师则对创作生涯与生计似有些担心,李文俊老师却笑着让他尽可放心。他还特意告诉我,福克纳最初一心一意写

诗,后来才改成写小说;在他看来,小说中有诗的感性,或许也可以另辟蹊径。分手时,他托我给他在美国买一本权威的福克纳传记。(翌年,我买到了书,但去了上海的M国际文化节,托朱虹老师给他带去了北京,他们在那里是邻居。)

还有一次是去北京参加“老书虫”文化节活动,住市中心的瑜舍酒店(Opposite House),联系了黄梅同学(顺提一句,我在信中称她大姐,她学问好,人也好),烦她安排车子,请李文俊老师夫妇一起过来,酒店里有个相当不错的餐厅。那天再版《意象派诗选》的出版人楚尘也来了(但可能是在另外一次,记不清了)。李文俊老师与张佩芬师母先到,正好可以喝咖啡多聊一会。我们确实聊了许多,李文俊老师说到他骑自行车到潘家园去淘小古董,顺路再去菜市场买菜,还是那样乐呵呵的。人是物非,不变的是他对学生的期许。他给我带来了他自己出版的新书,也再次提到我在小说中写诗、译诗的尝试,要我走自己的路,随便别人怎么说。这又让我想到了他为我《意象派诗选》写的那篇序文。

李文俊老师其实一直在关注着我。他一次在《读书》杂志上撰文,提及我的第一本小说《红英之死》,说作品充分呈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氛围,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,说书中的主人公(作者)与在北图工作的前女友那一段,尤其写得精彩,回肠荡气。他知道一点内情,飘忽难测,似也有些许惋惜。然而,他译过艾略特的诗剧《大教堂谋杀案》,知道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之间的转换。可惜那本杂志已找不到了,上面所引用的只是大意。

李文俊老师也让我想到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。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诗人?或许,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诗,尽管其他人或许并不知道他译诗、研究诗,也写诗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至少,李文俊老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李文俊老师也让我想到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。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诗人?或许,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诗,尽管其他人或许并不知道他译诗、研究诗,也写诗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至少,李文俊老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见面不久后,刘先生还寄给我一本书,里面收入了一篇文章,其中提到我的少作《浮世的悲哀》,令我格外感动。后来我没有去香港,也没有再见过刘先生,但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,我的日常工作中却都离不开刘先生。最重要的是,刘先生在美国致力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,他与葛浩文主编的《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(先后出过两个版本)至今是我们在美国教授现代文学的主要教材。刘绍铭老师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,做出过重要贡献。至于他晚年寓居香港,笔耕不辍,对张爱玲研究格外有重要推动,对中西文学因缘,旧闻新知,都保持有态度的批评。

诗人李文俊

裘小龙

诗,后来才改成写小说;在他看来,小说中有诗的感性,或许也可以另辟蹊径。分手时,他托我给他在美国买一本权威的福克纳传记。(翌年,我买到了书,但去了上海的M国际文化节,托朱虹老师给他带去了北京,他们在那里是邻居。)

还有一次是去北京参加“老书虫”文化节活动,住市中心的瑜舍酒店(Opposite House),联系了黄梅同学(顺提一句,我在信中称她大姐,她学问好,人也好),烦她安排车子,请李文俊老师夫妇一起过来,酒店里有个相当不错的餐厅。那天再版《意象派诗选》的出版人楚尘也来了(但可能是在另外一次,记不清了)。李文俊老师与张佩芬师母先到,正好可以喝咖啡多聊一会。我们确实聊了许多,李文俊老师说到他骑自行车到潘家园去淘小古董,顺路再去菜市场买菜,还是那样乐呵呵的。人是物非,不变的是他对学生的期许。他给我带来了他自己出版的新书,也再次提到我在小说中写诗、译诗的尝试,要我走自己的路,随便别人怎么说。这又让我想到了他为我《意象派诗选》写的那篇序文。

李文俊老师其实一直在关注着我。他一次在《读书》杂志上撰文,提及我的第一本小说《红英之死》,说作品充分呈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氛围,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,说书中的主人公(作者)与在北图工作的前女友那一段,尤其写得精彩,回肠荡气。他知道一点内情,飘忽难测,似也有些许惋惜。然而,他译过艾略特的诗剧《大教堂谋杀案》,知道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之间的转换。可惜那本杂志已找不到了,上面所引用的只是大意。

李文俊老师也让我想到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。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诗人?或许,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诗,尽管其他人或许并不知道他译诗、研究诗,也写诗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至少,李文俊老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见面不久后,刘先生还寄给我一本书,里面收入了一篇文章,其中提到我的少作《浮世的悲哀》,令我格外感动。后来我没有去香港,也没有再见过刘先生,但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,我的日常工作中却都离不开刘先生。最重要的是,刘先生在美国致力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,他与葛浩文主编的《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(先后出过两个版本)至今是我们在美国教授现代文学的主要教材。刘绍铭老师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,做出过重要贡献。至于他晚年寓居香港,笔耕不辍,对张爱玲研究格外有重要推动,对中西文学因缘,旧闻新知,都保持有态度的批评。

黄子平老师说刘先生是一个妙老头,我深感刘先生的学术和文学生涯是一个时代的绝响。他有挚爱,也有洒脱,有担当,也爱自由。刘先生离开我们,天上又多了一颗星星。

“感时忧国”的刘先生

宋明炜

2023年刚开头,获知刘绍铭先生去世的消息。疫情这些年,时时听到令人心惊的消息。余英时、李泽厚、张灏、林毓生先生相继离世,我写了两句诗:“大师们都变成了星星,我们还活在暗夜里。”那几位先生,我只读过他们的书,但没有见过面。与刘先生,则有一面之缘,至今难忘。

刘先生是夏济安先生的学生,后来主持翻译夏志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许子东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夏志清整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叫‘obsession with China’,批评中国作家太顾虑中国的问题了。刘绍铭译本把这个观点译为‘感时忧国’。那么大家对此就很接受,因为‘感时忧国’在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传统。”我去韦尔斯利学院教书的时候,夏志清先生给我写信来,特意提到他第一次发表 Obsession with China 就是在 Wellesley College,那是六十年代后期。刘先生给了这个词组一个中文表达,对夏先生的原意有一定程度的改写。但这个改写却让这个观点更容易被中文读者接受了。我在读刘先生自己的文字后,甚至认为,“感时忧国”更是刘先生自己有检讨也有认同的一种气质。

刘绍铭先生是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,但现在很少人知道,他也是小说家。他和白先勇是同学,是《现代文学》创办者之一,曾经有过自己的文学青年的浪漫岁月。他除了翻译过《一九八四》,也写过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《二戏游记》等有文学情愫的作品。我记得读刘先生的文学作品,特别看得出“人穷志不短”,他写自己早年生计艰难,在餐厅打工,但有志于学,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在国外生活,有乡愁,也有感时忧国。到《二戏游记》(记得出版了好几本)写北美华人学术生活,虽然没有《围城》那样近于刻薄的态度,但也不是很有态度的,写人论事,都谨守学术伦理。《二戏游记》有抒情,但也有近于 exposed 的倾向,写出学术界风气的变换与沉沦。直觉上,刘先生在美国学术界是不快乐的。

我见到刘老师的时候,他已经在香港岭南大学多年了。那还是在2005年初春,刚从纽约返回香港的李雄溪教授领我去见刘先生。从屯门到了香港黄金海岸,初见刘先生,印象里他是一位慈眉善目、说话慢条斯理的老人。见到我时,他就非常慈祥地对我说:我是你的师爷。因为王德威老师曾留学威斯康星大学,刘老师那时也在那里任教。虽然王老师未必就是刘先生的入